

2403

遵义文史资料



遵 义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一辑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四月

目 录

遵义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丁芝珍 (1)
记遵义大水.....	刘庚扬 (10)
刘眉生烈士事略.....	刘伯禄整理 (16)
刘眉生像赞.....	喻界凡 (20)
我的回顾.....	张光昭提供 王先知整理 (21)
故乡·母亲.....	徐行一 (27)
我父亲和红军的一段交往.....	李昇明 (30)
忆在遵传教七年的牧师薄复礼先生.....	宁文生口述 周建初整理 (33)
从戎北伐.....	陆金贵口述 陆绪水整理 (38)
记蒋丕绪与简文波之争.....	安蜀邦 (44)
忆娄山关和遵义战役黔军溃逃实况... 李惕生 王维儒整理	刘鹤鸣 遗稿 (47)
关于一二一师参加抗战的简介.....	黄宝贤 (56)
柏宪章在抗日战争中牺牲.....	柏思智 柏义方 (59)
国民党陆军大学在遵历史片断纪实.....	孟恒昌 (61)
抗日战争时期陆军步兵学校在遵义.....	裴遐昌 (95)
遵义机场修筑情况记.....	翁仲康 (105)

一九四一年的遵义警察局和保警队

.....谢正达 史小波整理 (112)

遵义“洪帮”的演变与活动

.....李春银 运怀动 李桢祥 (116)

播声报的兴衰.....周雨生 (137)

黄云同志谈遵义电影.....王永康整理 (143)

抗日战争后期木刻艺术的传播.....陈耀寰 (149)

遵义早期的京剧活动.....杨祖恺口述
小 华整理 (160)

遵义京剧团的前期情况.....许光裕口述
许立黔整理 (166)

遵义牛灯.....敖明龙 (168)

我在川剧团一段的回忆.....秦 勇 (171)

越剧团在遵义.....侯枫轩 (179)

遵义民间艺术三则.....李永林 (183)

我对遵义三中回忆之片断.....黄康迪 (186)

我知道的遵师的政治活动.....张声溶 (191)

贵州省遵义高级中学的创立.....赵元端整理 (201)

私立豫章中小学与江西会馆渊源.....周雨生 (206)

我所知道的朝阳小学.....张荫辉 (210)

我对遵义音教会编演《壮丁》的回忆.....傅邦荣 (213)

回忆遵义中小学的歌咏活动.....喻 樵 (223)

“遵义民众教育馆”史况.....王永康整理 (226)

“遵义民教馆”民众茶园停办经过.....吴维藩 (253)

王官勤谈遵义民众教育馆.....王永康整理 (257)

建国前遵义的体育运动概略……………陈兴伯（260）

红军在遵义时期的卫生工作……………张 炎整理（281）

遵义西医的传入与发展……………张 炎整理（293）

一所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贵州省第五区
省立医院”……………张 炎整理（298）

遵义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丁芝珍

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在贵州遵义发生了一次人民群众愤怒捣毁教堂、医院，打伤法国传教士的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事件之后，在法国公使的军舰讹诈下，清政府执行了投降媚外的卖国政策，最后责令贵州官府允许在遵义重修教堂、赔偿银两，将事件为首者拿获正法、发配充军才了结此案，这即贵州近代历史上有名的“遵义教案”。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现了遵义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及其侵略工具的天主教的强烈不满；然而清政府和贵州官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却表现出对外国侵略者的卑躬屈膝、对人民残酷镇压的丑恶嘴脸。两相对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跟随外国资本主义一起侵入中国，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传教特权”，肆意横行，利用天主教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一八四四年十月，法国专使拉萼尼与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南京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特别是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和医院等传教特权外，又规定了“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

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①的特权。一八六〇年十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遂派钦差大臣奕訢与英、法两国全权代表额尔金、葛罗分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给英国。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里还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②的字句，这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就使法国在中国取得了较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传教特权”。两年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发还康熙年间所没收的教堂，其钦差大臣布尔布隆（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出：“传教士皆系端方之人，谒见地方官，务须示以体面”^③，而且声称天主教是劝人道理，遵崇君上，谨守中国法度。加入天主教后，一切民间祈神演戏赛会等费，各地方官不得向入教之教民摊派，信教者的人身、财产亦受到保护。这使传教士们到中国内地进行种种不法活动有了护符。

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三月，法国传教士、天主教贵州主教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的护照后，立即前往贵州巡抚署和提督衙门，出示护照，态度傲慢地迫使贵州官府承认他们在贵州境内的传教特权。之后胡缚理派传教士到贵州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建立教堂、修院，大量吸收教徒。一些大恶霸、地痞流氓，为了寻求教会的保护都纷纷入教，教会纵容教民抢劫杀人，为非作歹，激起人民群众的公愤，反洋教的呼声逐渐遍及贵州全省。

（二）

法国传教士凭借“传教特权”，在遵义府属各地的肆意妄为，纵容中国信教者中的坏人横行霸道，是导致民、教双方发生冲突，从而掀起以反洋教形式出现的群众斗争的必然结果。

清同治初年，法国传教士在遵义府属各县县城先后建立了天主堂。遵义县天主堂建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最初是租借的民房，一八六七年，法国传教士布沙尔在遵义老城的杨柳街之北首路东，购买了大量土地，大兴土木，修造了富丽堂皇的教堂，峻宇雕墙，十分引人注目。传教士在遵义大量发展教徒，“其入教多远来侨寓之人；或门户单薄，畏人欺凌者，倚之为保障；或犯罪潜逃，匿迹其中，而狡黠者藉为护符，亦所不免；求其实心从善者寥寥矣”④在遵义县城，大恶霸杨希伯、刘开文、郑小明、霍闻九、赵文庵等都受洗入教，他们为天主堂敲诈勒索，欺压孤寡老弱，强占别人妻女，掠夺群众财产；或出入公堂，包揽词讼，借法国传教士名片，保护犯罪教徒，逼迫官府改判或释放，甚至传教士可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贵州主教胡缚理在一八六八年就曾擅自向贵州巡抚衙门递送一件“照会”，推荐在天主教被弛禁以后因反对洋人而被罢官，后又投降洋人的前贵阳知府多文，“请予官复原职，从优奖励”⑤。传教士及教徒们的所作所为，在遵义人民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阴历五月初，遵义新、旧两城修建了瘟祖庙，为祭瘟祖醮，士民们入庙焚香，被教徒杨希伯上前阻止，后士民们迎至大十字街，杨希伯竟敢率领一批教徒在此等候，将祭醮群众手中的表章撕毁，同时还纠约一部分教民入庙，将神坛经像全部打毁，激起群众愤怒。

在杨澍勋带领下与杨希伯所率的教徒发生扭打，使街上秩序顿时大乱，遵义团防迅即赶到现场制止，才暂时平息了纠纷。天主堂恶霸杨希伯破坏祭醮的消息很快在遵义城乡传开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主堂，涌入院内，林司铎⑥因躲避不及而为群众打伤。这时郡守汪炳焘，县令刘绍观，协镇梁胜春闻讯后立即赶到教堂弹压群众，但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而且围观者越来越多。投降媚外的遵义郡守、县令进入教堂，将传教士布沙尔、林多默、赵类斯三人在团众护卫下，从小路逃入遵义县署内躲避。群众在教堂内未搜寻到传教士，断定已被官府庇护起来，怒不可遏，愤无可泄，于是将教堂房屋、门窗捣毁，“半日之间摧折殆尽”⑦。遵义居民传有沉带领群众将教堂设备、宗教用品、书籍什物全部查抄带走。与此同时，遵义城外总府坝爱仁堂（即天主堂所设之医铺）也被捣毁，当天之内群众在街上张贴了许多反对殖民主义者、反洋教的告示和标语。这以后在遵义人民群众中一直流传着“端阳五月五，瘟祖打天主”⑧的故事。

遵义官府见教堂被捣毁后，害怕群众又来县署，于是星夜派兵护送三教士到贵阳，不久林司铎病死，其余教民也大都逃往别处躲避。传教士布沙尔等向贵州主教胡缚理详述了案情之后，胡缚理立即向驻京法国公使罗淑亚电告请求处理，这一事件成为法国公使向清政府交涉之重案。

（三）

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根据贵州传教士编造的假情况，乘机进行讹诈，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和贵州官府一再妥协退

让，最后以向法国彻底投降而了结。

贵州主教胡缚理听了布沙尔等人的汇报后，立即函告法国驻京公使罗淑亚，并在七月派传教士梅西满到北京面交罗淑亚，根据胡缚理的信函和梅西满的口头报告，罗淑亚向清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从速处理解决。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在接到法国公使的照会后，立即表示要查明情况，研究处理。

罗淑亚在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编造了一系列谎言，说什么：“赵教士因在遵义县署羁收被伤殒命，医家查看明白，实系被伤身死。伊等十分逞凶，寻殴教民。该处庙内，放有磁十字架及佛像前铺下红毡，勒令跨越，并跪写出教甘结。地方官不但束手旁观，还将天主堂及教民之财物收去入官”⑨。还声称“贵衙门若因权力不及，未能迅速将此案办结，伊不妨派人协同中国所派委员将案内教中不合之事设法整顿”⑩。正当清政府向遵义府县和贵州巡抚了解事件经过情形时，罗淑亚又向清政府发出态度极端强硬的照会，并以武力相威胁说：“本大臣不能得两国所立约之遵照，豫拟离京前往天津，候本国水师提督到日，一同偕行，或接到电线回复，到此光景，亦惟结尾一法耳”⑪。在发照会要挟未能得逞后，罗淑亚又使出了军舰讹诈的诡计，原定十月十六日起程到上海约同法国水师提督溯长江而上，最后提前于十月七日动身先到天津，会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提出准备到上海与法国水师提督一起率领军舰赴各省催办“教案”的计划。同时向崇厚表示处理“教案”的两个办法，“一、照价赔偿；二、如不能赔偿，或将地方官吏更调”⑫。罗淑亚强调法国新任驻上海总领事即将到达上海，他有事需要与新任

总领事面商，顺便在上海等待四川、贵州的两个“教案”办理的消息，“如果十一月内不能办理结束，他就带军舰到四川”⑬。

对于法国公使利用军舰催办“教案”一事，外商主办的报纸作为新闻登载，各国公使都领悟到以后各省发生事件，

“凡有不合条约之处，莫如该国驻京大臣即宜亲身前往办理，毋庸在京徒费周章，耽延时日”⑭。

在法国军舰讹诈政策下，清政府为了讨好法国公使，总理衙门在十四日送了一件照会给罗淑亚，照会说：“溯自中国与贵国十月换约结好以来，遇有教务交涉事件，本衙门无不逐件尽心催办”⑮。并告之对于贵州“遵义教案”，清政府特别指派了投降媚外的洋务派李鸿章办理，说：“李中堂为国家重臣，曾任上海通商大臣，于洋务、教务洞悉机宜，今奉命专办两案（酉阳、遵义），自必持平办理”⑯。

正在四川查办酉阳州爆发的群众反洋教斗争的清政府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湖广总督李鸿章，一八六九年九月接到总理衙门的“谕旨”，要他负责主持“遵义教案”的调查处理。于是李鸿章派了熟悉洋务的专员观察使余思枢和原籍遵义的四川即补道蹇澂同赴遵义调查办理，但由于法国传教士态度强硬，未得结果，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李鸿章又派成都将军崇实到遵义，经与民、教双方商议，对“该堂行教一事业经开导就绪，而教士迟久并无出省日期，是民、教两面尚未切实议结，不得遽谓完案”⑰。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崇实又委派熟悉教案的洋务派多文至贵阳，会同巡抚曾璧光与贵州主教胡缚理交涉，最后决定“遵义以及各处共九案，赔偿银八万两，其中贵州一万三千两，重庆七千两，汉

口二万两，上海二万两，宁波一万两，广东一万两”^⑮。此外对于“教案”中有关的人员也作出处理，“傅有沅纠众抢夺，罪犯应死，业经拿获讯明正法，应毋庸议。杨希伯挟嫌逞凶，激成众怒，致将经堂打毁，殊属不法，发极边烟瘴充军。杨澍勋与杨希伯争殴，酿成巨案，亦非寻常肇衅可比，拟请杖二百，流二千里，分别发配，折责安置”^⑯。一八七三年，法国传教士用“遵义教案”的赔款又重建了遵义天主堂。至此，“遵义教案”算是全部结清。

(四)

一八六九年遵义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是贵州近代史上掀起的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它虽然最后以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的彻底投降而结束，但是，它为贵州遵义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使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过程。在这次斗争之后，遵义人民在一八七六年、一八八二年、一八八四年又不断掀起了反对法国传教士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纵容不法之徒屠杀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遵义天主堂在一八八四年又一次被人民群众拆毁，直到一八八六年由贵州官府赔款，才第二次重新建造了遵义天主堂，这以后，法国传教士害怕遵义人民再度掀起反侵略斗争，便在天主堂下挖了两条地道，一条直通遵义县衙门，另一条通往城外，以便再发生“教案”时，可以通过地道逃跑^⑰。

遵义人民不断掀起的反对外国宗教的斗争，对于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投降政策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在处理“遵

义教案”时，由于这一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的浩大声势，清政府不敢对遵义群众强硬镇压，而是去作“劝导”工作，“晓以大义，如此次持平办结，以后复准行教，必稟请抚臣谕商教士，明定规条，使民、教一体，不至如前此之欺压善良，把持公事，但令大众晓然，于此后并无深害，当可宛转听从”②。以上说明，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官、夷、民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人民群众不断掀起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的斗争，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原来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而变为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官、夷、民三者的重重矛盾和变化，构成了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也是曲折艰巨的，但是近百年来的斗争历史，仍然昭示了中国人民必胜，中外反动势力必败这一伟大真理。

注：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1840—1980）上海知识出版社第6页。

②《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上海知识出版社，第23页。

③《续遵义府志》卷三十 宗教 第14页

④《续遵义府志》卷三十 宗教 第20页

⑤周健钟：《贵州三“教案”》第117页

⑥司铎即天主教中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

⑦《续遵义府志》卷三十 宗教 第20页

⑧同上

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八、第3页

⑩同上

⑪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八，第10页

⑫《清实录》穆宗实录卷二八一，第11页

⑬周健钟：《贵州三“教案”》贵州人民出版社第129

页

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一，第34页

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八，第29页

⑯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八，第29页

⑰《续遵义府志》卷三十 宗教 第22页

⑱《续遵义府志》卷三十 宗教 第23页

⑲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第16页

⑳周健钟：《贵州三“教案”》第164页

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第28页

记 遵 义 大 水

刘庚扬

“水打捞沙巷的年”，是遵义相传了一百八十余年的一句俗语。过去对不知时间的事实，即以此语答之。直到现在，知道究竟是何年的人，还是很少。既不知道，而又互相传说，也有它的道理。遵义老城，西南面是山，东北面湘江环绕，地势比湘江高，没有被水淹的危险。捞沙巷是在城中心靠东边的一条小巷，更没有被淹的可能。当时不仅被淹，而且冲去了房屋数十家，淹死了一百多人，造成了奇异的水灾，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事后对不知时间早晚的回答，常用此语。其实在史志中，即有详细的记载。

一九八三年为市志办标点《旧府志》，在第二十册四十七卷杂记中，有《黎安理①记遵城水一文》。具录于下：

“嘉庆辛酉春，长子恂②游庠，余送之郡，谒先师释菜③。是日天朗气清，夜闻寝矣。至丙夜，雷电大作，猛雨翻盆，屋瓦磳磳格格，几欲塌而不能支。惊起则被褥尽濡，电光所烛，见室中水已深尺余。而雷雨更甚，如天崩地裂，澎湃奔腾，水不及簷仅寸许。满城喧呼号哭，闾溢街巷。余黑夜立水中，直不知犹在人世。延及曙，街水尚数尺。乃知水由水井湾半坡暴涨而下，冲决当路房宅。淹捕署④近一丈，迳天后宫⑤，倒砖壁，横流大十字。合西门沟之水，盪

大街。倒药王宫⑥砖壁，殿前石缸二，冲至熊姓门。直流下捞沙巷。有汪姓二宅及中男妇七口，并地基冲低三尺，尽没乌有。折出东右水门⑦入湘江。计街房冲去者数十家，丁口淹没者百余人。人皆疑为有神物游焉，而实无有也。当时滂沱大作，如排山倒海而至，即长江大河，巨浪涵沸，不能状之。其山潦直泻千仞，急流奔注，既无沟渠以纳之，又无隄防以捍之，一任其猖獗汎滥于城市而无如何，盖势然也。其人民之死于水，房舍之漂没于水者，亦其数焉。时捞沙巷口柳树间，流一人援树呼救；一流至右水门，其颈为栅柱所夹；一冲落天后宫侧阴沟口中，水倒碑盖其口冒而过。俱得不死。非数不在水劫欤！时嘉庆辛酉三月廿六日。”⑧

本文就是“水打捞沙巷”传说的根由。据文中所述水的来源，是由水井湾半坡暴涨而下，汇合西门沟的山水而造成的。也就是玉屏山左右两边的水。来源很短，水量却大，一定是有伏藏地下多年积水，及时暴发出来，不足为怪。

其次传说的，就是“戊寅年涨大水”。此次大水，没有细查“新旧府志”有无记载，仅得之于传闻。时间不是嘉庆十三年（一八一八年），就是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湘江桃溪同时都涨大水。高度有在老城东门城墙垛口坐着，可以洗脚的传说；新城则在回龙寺前邻湘江石岩上，其朱塗的“天子万年”四字下⑨，就是大水涨到的标志。大家都认为像戊寅年涨的这种大水，在遵义要数十年才会有一次。水灾情况，少有传说。侥幸的是回龙寺山麓的狮子桥未被冲坏。近有记载谓桥被冲去，不符事实，应予纠正。

由嘉庆戊寅到现在，已有一百六十余年；光绪戊寅到现在，也有一百余年。时间相当长。但是在一九一六年（民

国五年）却涨一次，比“水打捞沙巷”“戊寅年大水”都大得多。那时我已有十一岁，在棉线街胡吉新家私塾读书。当时目见耳闻，就现在尚能回忆者，予以概述。

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五日，（民国五年，农历丙辰，四月十四日）清晨，未落雨，两城人民，照常活动。我家住在新城湘山湘水间之刘家湾。二哥刘圣知，年十七岁，在老城中学堂读书，即现在十一中。他由家中去学校上课，经过万寿桥（现在的新华桥），没有涨水的现象。到校后即下大雨，河中水涨，很快就翻过了万寿桥（是平桥，不高），不断涨，新城靠桥头的磐安门进了水，涨到街上，很快磐安门封洞了，两城交通断绝。丁字口邻近湘江，地势低下。河中涨水与盐行街冲下来的水汇合，涨得很快。居民由登楼而上房顶，水亦上房，全市都在洪水中。街上屠户卖肉的大木案桌，亦浮起来。好在丁字口不当水津，是死水上涨，同时又是白天，没有造成“水打捞沙巷”冲去房屋，淹没人口的祸灾，也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刘家湾，则因地势较高，没有波及。但是在水涨得过高的时候，我家对门住的堂叔刘小园，曾来我家后面响水洞看水势，是不是有翻过刘家湾与响水洞汇合直冲而去的危险？即此可见其来势之汹涌。我与家中人等看水，就是在小园二叔家邻河楼上，正对白虎头唐家坟，水直涨到坟脚。这边的水，进了头道后门，直到二道门口。河中洪水，奔腾澎湃，一浪高一浪地不断而来。因为水涨得太快，沿河一带的碾房、居民、一扫而空。冲来的房屋、家具、水车、六畜等浮满江面，应有尽有。不是夜间，少有连人都冲走的事故。但是由金顶山到合口，邻河低田，所有禾苗，都被冲去，连田土都括出老底来，灾情相当严